

阿努拉达·甘迪：造反派

(我们对译文做了技术性修改)

阿努拉达·甘迪出生于特权阶层，本可以选择轻松的生活。但她却选择拿起武器，为那些无所依靠的人去战斗。

2008年4月，在孟买一个闷热的晚上，一位医生正急切地联系一位病人。病人是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那天早上发着高烧过来看病。医生给她验了血，看完血液检测报告后，他开始疯狂地给这个病人打电话，电话号码是病人匆匆留下的，而且笔迹几乎难以辨认。他很快就意识到，号码并不存在。医生很不安，因为血检报告显示，在该妇女的血液中存在2种致命的疟疾病毒，她必须住院治疗，不能延误。时间在流逝，但病人毫无踪迹。

等这位女士再次联系医生的时候，已经几天过去了。医生要求立即对她进行重症监护，但是已经太晚了。

4月12日早晨，阿努拉达·甘迪死了。她的多个器官出现衰竭，她的免疫系统被系统性硬化症破坏，而且她还患有一种免疫性疾病，让她死前无法正常书写。

“阿努”——这是人们对她的亲切称呼——的死讯立刻在她的朋友和追随者中传开了。不久，消息传到了印多拉——那格浦尔城的一个贱民居住地，阿努曾经在那住了七年。她的化名佳纳克伊——作为印共（毛）最高决策机关中央委员会唯一女性成员的名字，出现在印度内政部档案中。

为什么一个孟买高等法院高级律师的女儿，一个毕业于孟买著名的埃尔芬斯通学院的社会学硕士，一个来自特权阶层的女孩，最终选择在巴斯塔诡谲的丛林中，拿着来福枪，裹着防水帆布，过那种艰苦而危险的生活？答案或许和她生活的时代有关，亦或者和她个人性格有关，又或者和这两者都有关系。

阿努拉达的父母是加内什·尚巴格（Ganesh Shanbag）和库穆德·尚巴格（Kumud Shanbag），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在印度共产党的办公室里举行了婚礼。加内什·尚巴格还是一个年轻男孩的时候，逃离了家乡库格省，加入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的军队，后来，他成为一名律师，曾经为特伦干那省被捕的共产党人辩护。他的公文包里装满了代表被捕同志提交的请愿书，而妻子库穆德则忙着编织收集毛衣，送给当时中印战争中与中国作战的士兵。

阿努拉达的哥哥苏尼尔·尚巴格，是一名进步剧作家，他回忆，阿努拉达学习成绩很好，并且喜欢参加课外活动比如跳舞。她也非常热衷于了解公众事务。苏尼尔说：“我住在寄宿学校的时候，她会给我写信，讨论有关银行国有化的问题。那时她只有12岁。”带着这种特质，阿努像其他的女孩一样，在1972年上了大学。“那个时候，她和任何女孩一样，喜欢在家里烫头发，”库穆德·尚巴格回忆道。

70年代初是令年轻人兴奋的日子。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GPCR。越南在激烈的抵抗美国军队。此时在她的家乡印度，响起了一声春雷——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了。成百上千来自高等学府的学生放弃自己的学业，加入了纳萨尔派运动。来自富裕家庭，出国深造归来的年轻人，

变得越来越激进。他们当中有一人是杜恩大学的校友，桑贾伊·甘地的同学，科巴德·甘迪。科巴德·甘迪的父亲是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高管，他们一家人住在沃里岛上的一个海景公寓。他前往英国学习特许会计课程，在那里他开始参加激进的政治活动，并且放弃学业回到印度。

同时，阿努则成为一名讲师，但她致力于参加进步青年运动（PROYOM），这个运动是受纳萨尔运动鼓舞而产生的。后来，她成为孟买公民自由运动的火炬手。正是在这期间，阿努拉达认识了科巴德。不清楚是谁影响了谁，但很快两人都变成了“坚定的社会活动家，”一个共同的朋友这样形容他们。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库穆德还清楚的记得有一天科巴德来他们家拜访。“坐在那条椅子上的是我丈夫，”她指了指说，“于是科巴德上前跪下说：‘我可以娶你的女儿吗？’”

两人在1977年11月结了婚。

到了1980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一支纳萨尔小队进入丹达卡兰亚森林——这是一片广袤的森林，分布在安得拉邦、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和奥里萨邦——建立游击根据地。1981年，“人民战争”的创始者，孔达帕里·西塔玛莱雅（Kondapalli Seetharamaiah）提出他希望在安得拉邦举行的激进学生联盟会议上与科巴德会面。他希望把“人民战争”引入马拉施特拉邦的加德奇罗利地区。毛主义理论家瓦尔瓦拉·拉奥说两人的会面为人民战争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成立铺平了道路。

这对夫妇兑现了承诺。一年后，阿努拉达搬到那格浦尔，那里有马哈拉施特拉邦第二大贫民窟，也居住着大量贱民（1956年10月，正是在那格浦尔，安培多伽尔B.R宣布改信佛教）。她一开始住在拉克达地区的一间单人公寓里。库穆德记得和丈夫去探望她的情景。“当我们看到她居住的地方，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库穆德说道。屋顶很多地方漏雨，而雨下了一整晚。“陪我们一起来的助手爬到桌子下面躲雨，睡在那里，”库穆德回忆道。

到了1986年，阿努搬到了那格浦尔北部的印多拉地区，那是贱民的政治中心。她在一个叫Khushaal Chinchikhede的邮政员工的房子里租了两个小房间。“在他们房子里，除了满满两箱书和一个泥罐，其它什么也没有，”Khushaal Chinchikhede说。阿努拉达在那格浦尔大学做兼职讲师。后来，科巴德也住在那里。两者都在外面工作到半夜。阿努拉达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后来在其他活动人士的坚持下，科巴德才买了一辆助力车。

印多拉因为充斥着流氓暴徒而臭名昭著。“没有出租车或三轮车司机敢去那里，”在印多拉长大的阿尼尔·博卡说。但阿努拉达不为所动。“她会在半夜孤身一人骑着自行车通过贱民区，”博卡回忆道。他通过朋友认识了阿努。“她让我了解了很多事情，为我打开了整个世界，”他说。

因为阿努拉达，Devanand pantavne，一个空手道黑带变成了诗人，以及一个激进的文化艺术团的主唱。pantavne记得她总是要求按时完成目标。“如果我们某件事情没有按时完成，她会非常生气，”他说。另一个年轻人，SurendraGadling在阿努拉达的鼓励下从事法律工作。今天，他为各种活动家和被怀疑为毛主义者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她是我的指路明灯，”他说。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阿努拉达以身作则，在生活中引导人们。

1994年，一个女贱民，kamble Manorama，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律师家做佣人时死亡，律师的家人声称她是不小心触电而死，但活动人士怀疑她被律师奸杀。阿努拉达鼓动民众，由于她的努力，这件案子受到了邦议会和国会的关注。

在印多拉，阿努拉达最信任的副手之一是biwajibadke，一个4英尺高的贱民活动家。“每天早上badke会来到她家里，边喝茶边分享消息，”朋友回忆。后来，当他被诊断出患有咽喉癌，阿努拉达把他带到家中，照顾他几个月。另一个助手Shoma Sen回忆说她非常关注别人的生活。她的房子向所有人开放。“只要有人来，她就泡茶招待他们，”她说。

因为她的缘故，许多来自富裕家庭的人受到鼓舞，成为活动家。她的老朋友和助手苏珊亚伯拉罕说：“当我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时候，经常看到和阿努相似背景的人们与你一起工作，这是令人振奋的。”

在90年代中期，阿努拉达加入了巴斯塔丛林地区纳萨尔派的领导层，转入地下。麦纳，一个印共（毛）丹达卡兰亚森林特区委员会的成员，记得阿努拉达曾经努力的融入当地部落：“好多人来询问她的情况，说嘀嘀（阿努拉达）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她不懂我们的语言。嘀嘀会微笑着走过去和他说：‘我理解你们的疑虑，那么就请教我你们的语言，我会向你们学习这里的一切东西。’”

丛林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游击队一直在不断转移，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还携带着沉重的行囊。即使这样，阿努从不逃避，她做着和其他游击队员们一样的事情。一个纳萨尔派领袖回忆说她从不缺席任何军事训练：跑步、爬行、俯卧撑等。麦纳说，“每当她摔倒在泥泞的土地上，她都会笑着爬起来。”

1999年，阿努拉达和游击队在恰蒂斯加尔邦的sarkengudem村宿营，警察包围了他们。双发发生了战斗。资深游击队员拉赫记得阿努立刻找到了掩护，瞄准她的“敌人”射击。后来，她总是回想起这件事，并因此要求年轻人学习游击战的技巧。但Sunil也记得她说过“总是随身携带着步枪并不舒服。”

她的身体并不适应这种非常艰苦的生活——在丛林里她经常遭受疟疾之苦。在某一个夏天，她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后昏倒在地，同行的同志马上喂她喝葡萄糖水。显然，她中暑了。但恢复意识之后，她仍然坚持自己携带行囊，拉赫回忆说。

南巴斯塔在1998年-1999年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当地部落民吃的米饭，一半是谷物，一半是石头。游击队也一样，不过他们吃的时候会加上罗望子酱。“她每次都需要花很长时间，并和着水才能咽下这些东西，”麦纳回忆说。她也患了胃溃疡。“为了缓解疼痛，她会吃几块饼干然后喝一点水，”她说。

为了减轻负荷，阿努拉达把原先携带的毛毯子换成了一条薄床单，这让她患上了硬化症。

毛主义者经常在政府力量薄弱的地方发挥影响力。在恰蒂斯加尔邦的basaguda，当地需要在一个叫作Kota Chervu的水库兴建一座堤坝；这个水库供应着10个村庄的用水。但是当地政府一直忽视村民的要求。在阿努拉达的引导下，有30个村庄的村民前来做这项工作。对于做工的村民，每天

都给一公斤大米作为报酬。政府惊慌失措，要罚款 20 万卢比，但是人们拒绝缴纳。到 1998 年，毛主义者已经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兴建了一百多个水库。

阿努拉达也承担了了教育妇女的责任，她的教育方式是富有特色的。她经常给女游击队上课帮助她们解决碰到的问题，还撰写和翻译了毛主义宣传材料。她会把政治领袖的照片印在图上，向目不识丁的当地人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时，她也会就一些健康问题开设课程。

在这些事情的空隙间，阿努拉达会秘密前往孟买。“她回来的时候，我会给她的头发涂上油，并按摩她的身体。我想让她尽量放松，”库穆德说。

“最令人惊奇的是她总是比我们更了解电影和其他的流行文化，”Sunil 说。有一部他的戏剧在孟买上演，阿努拉达悄悄溜进来，看完这部戏，然后安静地离开。“我后来才知道她来过，”Sunil 说。

在 2007 年印共（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阿努拉达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这时，科巴德已经是毛主义者的核心的领导成员，负责党的文件。（他于 9 月 20 日在德里被捕）。

在阿努工作的基础上，毛主义者准备首次在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提出有关种姓政策的文件。她还起草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文件，引起了毛主义最高层领导的关注。

在丹达卡兰亚期间，她帮助游击队员了解合作社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使他们能够更好开展集体化工作。

在巴斯塔的时候，阿努拉达质疑了党内普遍存在的父权思想。她去世的时候，她正在和女干部一起工作，制定计划帮助她们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正是在贾坎德邦就妇女压迫问题给部落民上课期间，她感染上了脑型疟，导致了她的死亡。

阿努拉达的朋友 Jyoti Punwani 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曼莫汉辛格说，‘纳萨尔派，是对国家最大的威胁’。但我记得有一个总是在笑的女孩，放弃了自己富足的生活，只为了改变其他人的生活。”

在那格浦尔，我要求房东 chinchikhede 打开阿努曾经的房间。房间里只剩下门上的一张印有巴哈特·辛格头像的贴纸。这时太阳下山了，天空变成了深红色。一个陪同我的战友躺在了地板上，这是一张他非常熟悉的地板。他朗诵了 gorakh Pandey 的一首诗：

这数千年的岁月/是他们的愤怒/这数千年的岁月/是他们的痛苦/我只是恢复了他们破碎的语言
/用节奏和韵律/而你在担心/我会让这火势蔓延